责任编辑：戴菁　E-mail:daijing314@163.com　电话：010-62805132　　2013年12月30日

“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张旭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和贯彻改革开放国策，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改革开放”也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一词出现136次，“开放”一词出现28次，“改革开放”一词出现8次。那么，“改革开放”这个词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改革”本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这在汉语中早就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49年9月3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对于“改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改革，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改革”。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相继提出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如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中就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具体领域的“改革”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改革”二字虽然就出现两次，但明显跟原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国策意义的“改革”，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它也不是新词，在汉语中早就有之，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中指出：一九六〇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的“开放”就是其本意上的“开放”，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开放”。

“文革”结束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党和政府首先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为此，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规定。同年，7—9月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9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而中国搞现代化，对它们是一个刺激。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1978年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我们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1978年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李先念指出：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魅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一项决策：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根据会议精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两个不允许”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实现了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转折。

实践上的创新推动着理论称谓上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应该是对内改革。这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窥见一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提出过，但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实践的推进推动着理论称谓的创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0次，“开放”开始出现2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改革”出现84次，“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的从无到有、从有到重的过程。实践和理论称谓的双重创新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这是据目前所能查证的档案材料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改革开放”一词就不断地被使用。198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珠江三角洲各县引进外资、设备办工厂，上马快，受益快，中外双方皆满意。关键是：改革开放不走老路》，这是《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的把“改革”“开放”放在一起的文章。当然，这里的“改革”和“开放”中间还尚存一定的“距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报道，这才是《人民日报》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63次，“开放”出现48次，“改革开放”出现24次，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表明“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理论研究

基层党校资政研究的着力点

□高　青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委党校坚持按照“三个三分之一”制度及“七个二”的工作要求，把下基层调研作为锻炼科研队伍的一项基本制度，引导全校教研人员围绕市委、政府中心工作，针对工作中的普遍性问题、热点问题开展资政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宜昌党校资政研究工作还存在制度缺失、机制不健全和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结合宜昌党校实际，为进一步加强科研资政工作，推进思想库建设，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建立资政研究工作机制，提高组织化程度

一是建立资政研究指导机构。党校资政研究工作起步晚，需要加强系统资源整合，提升整体资政研究能力，因此，成立资政研究指导机构就尤为必要。基于宜昌党校实际，资政研究指导机构可以和校学术委员会并列，明确资政研究指导机构的职能是：负责资政工作的组织协调，基于课题需要在全校统筹协调全校教研人员组建课题组，参与课题研究；编辑刊印资政研究成果、信息；承担与市内外其他决策咨询机构的交流与联系工作。

二是成立研究团队。由于资政科研内容复杂、时效性较强，涉及学科众多，往往需要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因而可以组建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加强资政研究的合力。可以考虑和党校的学科分类结合起来，宜昌党校在2012年成立了“社会建设研究中心”“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基层党建研究中心”等三个中心，可以以此为基础，组建资政研究团队。通过团队中不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员的合作，加强成员之间的互补和交流，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源集聚的优势，形成相应的研究组织机制。

三是建立资政研究工作管理及成果奖励制度。可以考虑建立相对独立的、与教学和科研并行的资政研究制度体系，如资政研究工作管理办法、资政研究成果评选及奖励办法等，进一步规范资政研究工作，把资政研究成果纳入到绩效考评、职称评聘、岗位聘任、评先表彰等相关制度中，营造重视资政研究的氛围，以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推进资政研究工作的落实。

选准资政研究课题，做到有的放矢

一是引导教职工要紧贴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关注全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以战略研究、政策研究、对策研究为主要内容，选准资政研究课题，进一步推动课题研究与政策推进同步研究机制，构建以理论为支撑、以全市社会经济实践发展为中心，富有党校特色的决策咨询服务工作模式，提升党校为决策咨询服务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是争取市委、市政府领导给党校出题研究。校领导应加强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的联系沟通，主动汇报党校资政研究工作情况，通过与领导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找准领导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争取市委、市政府领导给党校出题目，党校围绕领导关心的问题开展研究，增强资政研究的目的性、针对性。

加强资政研究队伍建设，提高资政研究的能力

一是要增强教研人员资政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可以外请决策咨询专家对我校教研人员进行资政研究培训，就资政研究选题、策划、调研等问题进行辅导，提高全校教职工决策咨询意识和资政研究能力。多渠道创造机会选送我校教职工赴省内外知名决策咨询机构跟班学习，提高教职工决策咨询的研究水平、管理水平。继续选送教职工赴县（市、区）挂职锻炼，提高教研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咨询成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针对资政研究所需人才的具体要求，在教职工中选拔一批素质优良、奉献精神强的专职研究人员，组建一支专业的决策咨询研究骨干队伍。

二是引导学员积极参与资政研究。明确学员是资政研究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学员熟悉基层、发现问题更具有针对性的特点，让教师与学员共同研究现实问题，鼓励学员积极参与决策咨询，并撰写出研究报告，通过相关途径向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加强资政调研工作，提高决策咨询的前瞻性

一是重视调研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做好决策咨询研究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手段。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制定调研计划，全方位多角度收集调研材料，深入分析论证，摸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只有这样，才能把课题做深、做透，才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二是建立各种社会调研基地。可以依托与市委、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县市区的紧密联合和合作交流，在本市或外地建立各种社会调研基地，组织教研人员定期到基地去调研和考察。针对从社会调研基地掌握的现实问题，组织教研人员共同进行研究和解决，提高资政研究的前沿性、前瞻性和现实性、可操作性。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委党校）

科研论坛

他律与自律

——也谈学术规范

□岳　亮

学术，天下之公器。在汉语语境中，“学术”指的是学问、学识，或称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宋苏轼《十八阿罗汉颂》说：“梵相奇古，学术渊博。”“规范”则有标准、法式、典范的意思。所谓学术规范，指的是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而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

学术规范与学术失范

学术规范的对立面，是学术失范。失范，亦称脱序，指的是由于社会规范失调而产生的社会反常状态，即在一个社会中缺乏人们可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之意。

在中国古代，学术作为一种贞正人心、淳化天下的主要方式与途径，历来为士人所重视。学术的明晦，亦即学术的规范与失范，直接关系到人心之正邪，进而影响到王朝的盛衰与天下的治乱。清代李颙在《匡时要务》中说：“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淳；所好在词章，则正学晦，正学晦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治化不兴。”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欲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必先昌明学术。因此，“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首次提出学术规范问题以来，这一问题始终是学术界最为关注，也从未消停的话题之一。学者杨玉圣把当前学术失范的主要表现归纳为六个方面：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缺乏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脱轨；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学术道德败坏，等等。上述学术失范行为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而且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学术进步，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声誉。尽管国外也不乏背离学术规范的行为，但国外学术界经过长期的学术发展与积累，学术规范极为详尽，对学术失范的成因及应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并且通过相关的程序确定下来，在规范学术活动的同时，对学术失范有一系列的防范和惩戒的强制措施。这些做法都值得国内学术界思考和反思。

学术规范的目的在于使学术活动制度化、学术研究标准化，从而使学术成其为学术。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道德和文化秩序在经济利益大潮的冲击下渐次失落，而新的规则和秩序机制尚未建立，进而导致了文化与行为上的失范。建立健全新的规范机制，在转型条件下，必然是学术生态环境下制度规则的他律与学者个人道德自律的结合。

他律：呼唤中国的“芝加哥手册”

近代学术研究方法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事实上，近代中国也正是从西学传入之后，才逐渐接受标点符号、引文注释等学术写作规范。西方的学术体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已形成具体的可操作性规范，这就是学术写作手册。

在美国，使用英文写作的学者都很熟悉一部名叫《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的写作手册。这部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一批资深编辑撰写的写作手册，自1906年初版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迄今已出了十几版，几乎囊括了学术写作和编辑所涉及的各个细节，是美国各出版社和学术杂志对稿件要求最常用的标准。《芝加哥手册》出版后，在学者、编辑和出版社的努力推动下，逐渐成为美国学术界共同遵守的规则，它既使学者、编辑及出版机构的学术活动有章可循，也对学者一些无心的犯错起到了预防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使社会开始整体关注学术规范问题。当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创的学术论文“匿名评审制度”已然为绝大多数学术刊物所采纳。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使用多年的学术界共同遵守的规定。西方学术体制的成熟与规范，显然与《芝加哥手册》这样的技术细节和规则对学者的约束密不可分。

新时期以来，制订一部通用的写作手册已成为学界共识。社科院早在“十一五”规划里面就提到要推出中国的“芝加哥手册”。2012年，浙大出版社、三联书店、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几家以出版学术作品著称的出版社先后发布了自己的“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此举对于严肃学风和规范学术行为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这毕竟只是个别出版社对学术规范作出的努力，还处于个体、零散的状态，而且不同的规范也容易导致标准不一，让学者无所适从。总的说来，当前加强学术规范，最迫切的是整合国内知名出版社、学者、编辑的力量，推出一份全国统一的，既有中国传统人文特点，又适合中文学术研究现状的“芝加哥手册”，为规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自律：内心的道德律

康德有句名言：“世间有两种东西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学术研究实质上是个体行为，除了外在约束机制的他律，内在的道德修养和职业伦理的自律，即学术道德是学术规范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主体历来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孔子说要“行己有耻”。汉代哲学家仲长统将“实不知详不言，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受无名者移知者”斥为天下学士“三奸”。曾巩致信欧阳修说，“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黄宗羲将其一生的治学经验概括为七个字，即“修德而后可讲学”。在古代学人看来，“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学者若不先修道德，则不可以讲学，更不能为文。

现代社会，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职业，学术道德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职业道德。对于从事任一职业的人来说，遵守职业道德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法国社会家涂尔干指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有自己的伦理。”当职业伦理越发达，它们的作用就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也就越稳定、越合理。作为学界中人，只要是以学术为业或欲从事学术研究，都应自觉遵守学术道德，认同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公认的学术伦理，如尊重前人学术成果，征引注释规范有序、保持独立人格等。

学术道德是学术良知的体现，它反映了一个人的学术操守和治学之道。本世纪初，南京大学十六名教授联合倡议“以德治学”，呼吁发扬“以德治学”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树立精益求精的学术观念，杜绝一切急功近利的做法。毋庸置疑，大多数学者都能自觉遵守学术道德，认真敬业地从事学术活动，推动着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科研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罔顾学术道德的失范现象，不仅影响到学者的自身发展，而且给整个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当前社会各界对学术规范的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已经意识到学术明晦对于社会昌明的重要性。学术研究事业本身就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学者更应遵从内心的道德律，唯真理而从之。

创新才是学术的最高规范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学术研究的最高旨趣即是学术创新。学术研究缺少创新，学术的传承过程中不注重原创性研究，学术也必将失去应有的生命力。

当代中国学术的失范、无序，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则无疑是学术原创性的丧失。学术规范作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机制，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明确学术研究不可触碰的“底线”，更不是要禁锢学术的自由发展。我们强调通过学术规则的他律和学者自身道德的自律，建立学术界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创新、促进创新、实现创新。创新是学术成果存在的价值意义，真正规范的学术必然是以原创性为前提和指归的，创新才是学术的最高规范。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

学术评论